

全球社会学理论的新视角*

——兼论中国应对世界大变局的战略思考

宋林飞

提要:对于“世界怎么了”“人类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本文提出了“公平竞争、自主创新、善于博弈、化解风险、美美与共”的社会学理论分析框架。来自改革开放的“中国奇迹”,推动了世界经济中心转移,孕育了多极新兴周期;通过自主创新、非对称超越,中国正在重构世界科技版图;西方霸权焦虑上升,对华科技遏制加剧,我们要善于博弈,奋力突破围堵;后现代西方国家进入“自反现代化”阶段,必须化解风险、拒阻世界文明倒退;要基于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倡导建立平等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努力形成多极平衡的新世界秩序,加快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关键词:公平竞争 自主创新 新世界秩序 五要素钻石模型

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提出了“‘世界怎么了’‘人类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从社会学视角回应这一世界之问,揭示这一“世界之问”提出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是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课题。在本文中,我们尝试从“公平竞争、自主创新、善于博弈、化解风险、美美与共”等五个价值和行动维度,分析导致多极平衡的新世界秩序的形成与演进,并且把这五个分析维度视为构建新的世界社会学理论的分析框架,我们将其称为“五要素钻石模型”。

从世界现实出发,我们可以看到如下情景:在全球化进程中,改革开放造就的跨世纪“中国奇迹”,通过国际市场的公平竞争促进了世界经济中心的转移,创造了新的世界经济秩序;通过实施工业强基、非对称赶超战略,中国科技实力主要指标已经接近或比肩世界先进水平,科技发展模式正在从跟随为主引领为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智慧社会发展趋势与治理创新研究”(18ASH001)的阶段性成果。

辅转向引领为主跟随为辅,中国创新崛起改变了世界科技版图;科技霸权是二战后美国获得的霸权之一,21世纪以来美国的科技领先焦虑日益加剧,出于“不允许中国超越”的企图,近年来美国对华实施技术与产业链断供、芯片领域“卡脖子”等极限遏制,善于博弈、下好先手棋、突破围堵成为中国当务之急;在已进入后现代社会的西方国家,民粹主义、反智主义泛滥,加快了其走向“自反现代化”的步伐,他们抛弃了曾经参与制定的一些国际标准与规则,干涉别国内政,试图打断中国现代化的进程,逐步走进世界文明倒退的“埃利亚斯陷阱”,中国需要致力于认识风险、预判风险、治理和化解风险;单极“美国周期”进入中后期,霸权不可持续,各国应顺应世界多极化趋势,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建设平等和平、合作共赢、理性智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公平竞争: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奇迹”

世界社会的基础是经济格局。世界百年未遇之大变局,首先是世界经济格局的大变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也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这意味着世界经济中心的转移,标志着世界经济正在从单极独霸的“美国周期”转向多极平等的“新兴周期”和世界经济新秩序。把握住这一点,是理解世界经济格局大变局的关键。

(一)“中国奇迹”创造世界经济新秩序

在中国实施改革开放之前,现代世界经济在20世纪出现过两次奇迹,第一次是五六十年代的“欧洲奇迹”与“日本奇迹”;第二次是六七十年代的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面对的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主导的世界经济格局。1970年,美国以1.08万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在世界主要经济体排名第一,远超当时以0.43万亿美元而排名第二的苏联;^①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中国一直是经济排名第八的发展中国家。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1991年苏联解体以后,原成员国大多跌出世界主要经济体行列。中国则通过不断深化的改革开放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促使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中国经济奇迹”初露端倪

^①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主编的《世界经济年鉴》有关数据测算。

(宋林飞,1995)。1979—2012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速达9.8%,比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速2.8%高7个百分点。^①

来自市场竞争的繁荣让中国经济不断登上新台阶。2006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外汇储备国。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同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01年,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际,各国的最大贸易伙伴是美国;2013年中国已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2018年130个国家与中国的货物贸易额超过了与美国的货物贸易额,中国成为几乎所有主要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2022)。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份额1978年只有1.8%,2012年快速升至11.5%,^②2021年达到18.5%。自2011年以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年均达到30%以上,超过美国、欧盟与日本的贡献率之和。^③2000年,中国经济总量相当于美国经济总量的10%,2021年上升到77%以上,^④稳居世界第二。

中国自力更生建立了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目前联合国对现代工业体系的分类包括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⑤中国已涵盖全部大中小类,拥有领先的制造业、完善的供应链。同时,中国交通现代化取得重大进展。截至2020年底,中国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到16.10万公里以上,连续七年居世界第一;铁路营业里程达到14.6万公里,其中高速铁路营业里程3.8万公里。^⑥特高压输电线路达到4.8万公里。^⑦智能化港口、智能化水电气系统等也成果显著。美国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指出,英国、美国先后各引领了一次工业革命,中国将引领第三次工业革命(里夫金,2012:Ⅷ)。

(二)世界经济中心的转移趋势

“世界百年未遇之大变局”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最重要“时代场域”,是中

①②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年均增长9.8%》,2013,央视网(<http://jingji.cntv.cn/2013/11/12/ARTI1384242201395565.shtml>)。

③ 《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30%》,2018,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mrdx/2018-02/02/c_136943961.htm)。

④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有关数据测算(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Y.GDP.MKTP.CD?locations=CN-US&name_desc=false)。

⑤ 《中国拥有联合国划分的全部工业体系,这一点连美国都不能完全具备》,2019,搜狐网(https://www.sohu.com/a/322413589_532219)。

⑥ 《交通运输部:截至2020年底 我国高速公路通车里程16.1万公里稳居世界第一》,2021,央视网(<http://m.news.cctv.com/2021/08/24/ARTI5rn2vPOqyKMJaeMNIpp210824.shtml>)。

⑦ 《3800亿!“十四五”国网将再建38条特高压》,2022,电力网(<http://www.chinapower.com.cn/xw/gnxw/20220117/128522.html>)。

国现代化进程中必须认清与正确应对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世界经济中心转移是一个长周期,包括若干短周期、中周期。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曾对世界经济史作过“短时段”“中时段”“长时段”的分类(布罗代尔,1997:66-70)。意大利经济史学家杰奥瓦尼·阿瑞基(Giovanni Arrighi)按照布罗代尔的历史分期模式,将资本主义经济中心更替划分为四个周期:15世纪到17世纪初是“热那亚周期”,16世纪末到18世纪是“荷兰周期”,18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是“英国周期”,19世纪末开始的周期是“美国周期”(阿瑞基,2011:7)。

中国的“百年大变局”是针对世界历史的中长时段而言的。前一轮中长时段,起自19世纪40年代,迄于20世纪40年代。以第一次鸦片战争为开始,其间充斥战争、掠夺的“英国周期”降临中国,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等将中国推入深重的灾难之中。此后,获得战争红利而发展、称霸的“美国周期”,与新生的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先后迎头相撞,成为影响甚至掣肘中国发展的重要力量。可以说,“美国周期”与中国共产党诞生百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百年“两个百年”相交汇,将是人类社会最辉煌、最多彩的阶段,也是世界社会发展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的阶段。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的建立,推进了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市场组织发展与全球化。与此同时,美国脱离联合国宪章框架,拉帮结派,干涉别国内政,发动局部战争,严重影响地缘政治的稳定。“美国周期”可被称为现当代世界战争与和平、发展与破坏的“矛盾组合型推手”。

(三)新老世界经济周期的区别

“两个百年”大变局处于新老周期交替的特殊时期。现有的理论积淀是阿瑞基(Giovanni Arrighi)提出的资本主义体系积累周期理论,这是世界体系理论的基础。从积累周期理论出发,我们尝试做以下引申与评析。

一是周期的积累性,新周期往往能够避开旧周期的弊端,发挥以往周期的优势,形成体系组织革命的“双向运动”(阿瑞基,2011:258-270)。这是强调新老周期的继承性、优化性,但我们并不能把过去历次世界经济中心的周期积累理想化,它们往往是新瓶装老酒、换汤不换药,都离不开战争、殖民与掠夺。对于即将到来的新周期,避开旧周期的弊端显得非常重要与迫切。

二是周期在时间上有相似的长度并呈小幅缩短趋势,从两个世纪以上缩短到不足两个世纪。当前世界仍然处于美国周期之中。从历史的经验看,美国周期也难以持久存在,必有其衰退之日。

三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中心的形成依靠的是全球化。首先,“热那亚周期”

出现了发明全球化。中国古代三大发明“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马克思，1978：67）。“荷兰周期”的原始全球化依靠的是“地理大发现”、海外贸易、殖民侵略，荷兰因而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中心。“英国周期”的初级全球化依靠的是蒸汽机发明、工业革命、瓜分世界，英国因而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中心。“美国周期”的现代全球化依靠的是科技革命、全球市场、霸权武力，走的是与英国周期相似的路。如今时代不同了，未来的新兴周期不会重复“昨天的故事”，将描绘出符合世界人民向往的新篇章。

四是新的世界经济政治中心形成与替代的重叠性。旧周期与新周期的交叉重叠是一个“中时段”。美国周期代替英国周期是如此，代替美国周期的新兴周期也将是如此。现在世界关注的是，美国周期以后出现的会是什么周期？有人说“21世纪是中国世纪”。我们不赞成用中国冠名即将到来的新兴周期，因为新老周期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我们认为，正在到来的是“21世纪新周期”不再是任何一个国家独霸的周期，而是“多极周期”。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群体快速成长，坚持反对霸权，主张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多极周期的主要特征。传统世界体系中国家间“弱肉强食、霸凌欺诈”的丛林法则，在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的进程中受到了越来越有力的制约。世界经济中心转移、新旧周期交替将在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和平共处的新世界秩序中形成，这就是历史进步的新力量与新逻辑。

二、自主创新：改变世界科技版图

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恩格斯，2009：602）。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是世界经济格局与世界秩序变化的驱动因素，是“美国周期”向“新兴周期”转移的深层次逻辑。

（一）中国崛起的自主创新战略

世界经济新格局逐步形成的主要推动力是科技现代化。近几十年来，中国依靠自主创新，转变过度依赖劳动、资本、土地和物质资源投入的经济增长方式，在高技术领域取得一个又一个突破，成为发展中国家科技进步的排头兵。中国科技实力与美国的差距不断缩小，有些方面开始与之比肩或有所超越，从而成为

推动世界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重要力量。

中国科技实力的崛起有赖于如下几个国家战略的实施。

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中共中央、国务院早在1986年就批准实施《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邓小平指出：“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邓小平，1993：279）。1988年，经国务院批准，科技部组织实施火炬计划项目，重点发展电子与信息、生物技术、新材料、光机电一体化、新能源、高效节能与环保领域的高新技术产品并形成产业。之后，国务院批准成立了一批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成为高新技术产业聚集区。1995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宣布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要求聚焦与跟踪世界科技先进水平，自主发展我国高新技术与产业。

实施创新型国家战略。2005年11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要求。从2010年开始，国家发改委、科技部支持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建设，突出创新能力的提升。此后，国家科技部又支持创新型县（市）试点建设，分别以科技支撑产业发展、生态文明、民生改善为主题。从有关评估结果看，创新型城市建设、创新型县（市）建设都取得明显成效。

实施创新驱动战略。2012年12月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要把全社会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创新发展上来，走到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前列。党的十九大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要求突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建设数字中国、智慧社会。2016年5月，党中央、国务院公布《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部署创新型国家与世界科技强国建设，致力于破解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发展难题，为我国未来的发展明确了方向与着力点。

实施工业强基战略。2015年5月8日国务院印发《中国制造2025》，着重破解核心基础零部件、关键基础材料、先进基础工艺和产业技术基础（“四基”）严重依赖进口的问题，要求到2025年“四基”大部分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在智能制造、绿色制造和高端装备创新等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重点领域走在世界前列。

实施非对称赶超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优势，在关键领域、卡脖子的地方下大功夫。”“着力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加速赶超甚至引领步伐”（习近平，2016：42、49）。这一战略方向明确，在卡脖子的地方强化自主创新，以打破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我国“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即实施重点科技研发计划，率先在可能产生颠覆性突破的电子信息、人工智能、未来通信、虚拟现实等高科技领域优先布局。

(二) 世界科技实力版图的重构

现代社会的科技重大创新与突破成为引领与推动世界经济社会发展、调整与重构世界经济政治关系格局的主导力量。世界百年未遇之大变局深层次的根源是新一轮科技革命。为了反映这一科技革命的重大影响,我们曾尝试构建“世界科技现代化指标体系”,运用各国政府部门数据,采用定量方法观察全球科技实力格局变化。这套测量指标包括六个一级指标,即人才资源、研发投入、科技创新、科技产出、科技贸易和科创中心,以及21个二级指标。我们利用收集的比较可靠的数据进行整理分析(罗青,2012;陈明等,2015;陈钰、玄兆辉,2021;王烁,2016;陈钰、徐英华,2018;方陵生、梁偲,2018),结果表明,美国科技实力仍然保持世界领先,中国具有日益扩大的科技资源优势与创新优势,具有不断提升的科技创新能力与产业竞争力,科技创新模式正在从跟随为主引领为辅迈向引领为主跟随为辅。美中、欧亚等多极化科技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三、善于博弈:西方的科技遏制与中国的突破策略

如果说,“世界百年未遇之大变局”的基础场域在于科技创新,那么,这一大变局的“中心场域”则可以被定义为“大国关系的共处、博弈与冲突”。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将“场域”界定为“位置之间客观关系的网络或图式”(Bourdieu & Wacquant,1992:97)。我们对于世界百年大变局的中心场域的认知是共处徘徊、博弈加剧、冲突时现。在这个中心场域,中国要善于博弈,“注重堵漏洞、强弱项,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①

美国的世界霸权以科技霸权为基础。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美国仍然走在世界科技强国的前列,中国呈现科技创新发展的强劲势头,与美国的差距不断缩小,这种趋势使美国的“首位度焦虑”越来越严重。2018年8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提出,中国“不能再迅速发展并超越美国了”。^②2019年4月12日,特朗普在白宫发表讲话时宣布,美国必须要获得全球5G竞争的主导权,不能允许其他国家超过美国。^③这些表态充分表达了美国遏制中国崛起的意图。

① 《下好先手棋 打好主动仗——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重要论述综述》,2021,人民政协网(<https://www.rmzxb.com.cn/c/2021-04-15/2829683.shtml>)。

② 《特朗普夸口已阻止中国超美势头 美媒:想要遏制中国崛起》,2018,《参考消息》8月23日。

③ 《特朗普称美国必赢5G竞赛 美媒质疑:能赢得了吗?》,2019,《环球时报》4月15日。

拜登上任后延续了特朗普的思路,他在第一场记者会上就宣布:“在自己任期内绝对不允许中国超越美国”,^①并表示,首先要强化美国在量子科技、人工智能、生物计算等新兴技术领域的投入,将这些资金从现有占美国 GDP 的 0.7% 提升至 2%。^② 2021 年,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了“2021 年美国创新和竞争法案”,力图推动美国创新领域发展,对抗来自中国的影响与保持竞争优势。

在美国的引领下,西方国家对华遏制动作频出,更深层的影响则是引发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中激烈的大国博弈。概括而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除了以往一直实施并且不断强化的对华技术贸易出口管制外,在新近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第一,对中国高科技产品加征关税。近几年来,美国政府强调,美国在全球科技中的主导地位已经受到中国的挑战。美国加税首先瞄准的是新的信息技术、自动化机床、机器人,目的是遏制中国高科技与产业发展。2018 年 3 月 22 日,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在国会对华贸易制裁作证时说,如果让中国达到领先水平,将会对美国非常不利。所以,美国对中国打贸易战,首先将矛头对准了中国出口美国的高科技产品,以遏制正常的科技市场竞争。

第二,防范中国人工智能技术领先。在人工智能领域,美国最担心的是中国超越。2019 年 2 月特朗普签署了《保持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先地位行政令》,决定通过政府干预,保证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先地位。

第三,阻止中美科学研究合作。2018 年,特朗普政府发起所谓“中国行动计划”,在美国实验室和企业中寻找“华裔间谍”,先设立办案指标再进行查案,导致许多冤假错案与明显的种族歧视,阻碍了中美科学研究的合作交流。

第四,切断对华高科技产品供应链。近四年来,美国政府将 300 多家中国科技企业与大学列入实体清单。欧盟、日本等国与美国的出口管制保持一致。2021 年 4 月 21 日,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通过《2021 年战略竞争法》,目标是确保美国在关键和新兴技术的创新方面处于领先地位,“抵抗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力”等。5 月 12 日,美国参议院商务委员会审议通过了《无尽前沿法案》,投入 1000 亿美元用于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先进通信、机器人等领域的科学技术研

① 赵建东,2021,《拜登:不寻求与中国对抗 但威胁不允许中国超过美国》,环球网(<https://3w.huanqiu.com/a/c36dc8/42SULubvtop>)。

② 《任期内不许中国超过美国?美教授:特朗普都挡不住,拜登也做不到》,2021,排头军史(<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95295506251140508&wfr=spider&for=pc>)。

究,规定严格限制与中方有联系的科学家参与美国科研项目。6月,美国参议院通过《2021年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投资2000亿美元“应对中国”,对抗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①

第五,实施“卡脖子”战略。2018年,美国政府禁止美国企业向中兴公司销售芯片;2019年,美国政府切断华为公司海外芯片供应;2020年,美国政府将中芯国际列入黑名单,美国政府阻止荷兰ASML公司向中国出售光刻机;2022年3月,美国政府提议与韩国、日本、中国台湾地区组成“芯片四方联盟”(Chip4),企图将中国大陆排除出全球半导体供应链;2022年8月9日,美国总统拜登把《2022年芯片和科学法案》签署为法律,为了将芯片制造转移至美国国内,向美国芯片制造企业提供2520多亿美元的政府补贴、科研创新经费,不准接受补贴的企业在中国大陆发展精密芯片制造、不准向中国大陆提供14nm以下的半导体生产设备。美国商务部宣布芯片设计EDA软件、金刚石和氧化镓等芯片材料对华断供的禁令于2022年8月15日生效。^②

美国政府对华科技遏制手段频繁、升级,在他们垄断的高端领域对华“卡脖子”。针对美国和西方国家的这些遏制行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要锻造一些“杀手锏”技术,持续增强“全产业链优势”,“形成外方人为断供的强有力反制和威慑”能力。“加快关键技术攻关,打造未来发展新优势”。^③中国正在通过合作创新进行核心技术攻关,以突破重重围堵。美国的“极限打压”不可能阻挡我国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的步伐。

四、化解风险:拒阻世界文明的倒退

遏制中国科技与经济发达的西方发达国家都处于现代化后期阶段。现代化是否一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过程?答案是:不一定。西方社会学者发现,内在因素也可能成为现代化倒退的动力,先行现代化的国家也可能倒退。1986年,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提出了“风险社会”概念,认为“各种风险其实是与人的各项

① 《鼓噪对华搞全面战略竞争!美参议院通过法案,投资2000亿美元“应对中国”》,2022,环球网(<https://world.huanqiu.com/article/43SIJL4wH1p>),6月9日。

② 《美国断供这一软件,欲将中国芯片扼杀在“3纳米”》,2022,新京报(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22-08/16/content_821563.htm)。

③ 《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的主要突破口》,2020,光明网-时评频道(https://guancha.gmw.cn/2020-11/13/content_34366098.htm)。

决定紧密相连的,也就是说与文明进程和不断发展的现代化是紧密相连的”(贝克、威尔姆斯,2001:119)。在全球化时代,这种文明倒退的风险并不仅仅影响这些国家自身,还会严重影响整个世界,破坏世界秩序,阻碍人类社会进步。

(一)世界秩序的变化与世界秩序的评价标准

百年未有的世界大变局已经影响到现有世界秩序。国际社会应在世界秩序的变化中不断改善世界秩序,从而推动新的良好世界秩序的形成。问题在于怎么改善世界秩序。为此,首先要明确世界秩序的标准,据此对现有世界秩序做出科学合理的评价,才能找到改善的方向与目标。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结合当下人类社会发展的状况,可以考虑从世界价值、世界规则、世界交往、国家主权、国家利益、国际关系、国际互动机制以及主政品格等八个方面来研究建构世界秩序评价标准体系,以在这八个方面具有推动良好世界秩序发展的关键特征和要求为正向标准,将那些阻碍良好世界秩序发展的重要因素和诉求视为反向标准。现在的世界性问题是一些国家与政客不能一以贯之地遵循正向标准行事,经常发起反向标准的行动,给现存世界秩序带来严重干扰与破坏。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总是谈论“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但他们说的“规则”往往是“双重标准”。近期,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接受媒体采访时就不加掩饰地说:“国际政治中很大程度上存在着‘双重标准’”。^① 双重标准的本质就是蔑视原本应该普遍遵循的国际规则。中国维护以联合国宪章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反对任何国家在联合国体系内采取双标、长臂管辖、干涉他国内政的霸权主义行为,反对在联合国组织之外组织情报集团、军事集团,反对绕过联合国组织同盟对一国采取战争行动,反对任何国家把“家法帮规”当作国际规则。

(二)西方发达国家的“自反现代化”风险

贝克等人可能出于相似的担忧,提出了“自反现代化”的概念。“自反”就是“反自身”,就是“自我对抗”(self-confrontation)。他们指出,现代化进程越深入,“工业社会的基础便越是受到消解、消费、改变和威胁”(贝克等,2001:224)。在世界社会现代化进程中,自反性现代化特别容易在发达国家发生,并且在可能导致其社会内部自我撕裂的同时引发排外、仇外、对外暴力干涉的风险,甚至凭借

^① 《欧盟外长博雷利:国际政治很大程度存在“双重标准”,离开美国就无法解决中东冲突》,2022,观察者网(<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72580527479606391&wfr=spider&for=pc>)。

自身的强大武力频繁直接发动对外战争,或者拱火、支持代理人战争。这些风险不仅会在这些国家内部形成文明退步的陷阱,还可能阻碍甚至中断一国或多国的现代化进程。

其实,早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在《美国的反智主义》一书中就批判了美国社会层出不穷的民粹主义与暴力事件,揭示其背后人们对科技的崇拜、对人文价值的轻视以及消费主义的失控,提出了“智识”在人类文明中应该如何发展等问题(霍夫施塔特,2021)。如今,我们看到了西方国家遏制中国发展的理念与战略,这与美国历史与文化中的反智主义(悖逆真理、违背正义)的战略思维与行动逻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美国的历史与现实表明,周期性的反智主义在美国社会发展进程中根深蒂固地存在着。每当大选之际,主要候选人与许多选民往往陷入纠结、困扰于反智主义之中。近年来,美国政府在应对新冠疫情、接受总统大选结果、中美关系等议题上,不断爆出一些令人不可思议的“反智”表现。

(三)“埃利亚斯陷阱”的预警意义

德国社会学家诺伯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认为,文明进程可能与退化进程并存。文明进程相对长期,退化进程却可能迅速地占据主导地位(Stephen, 1990)。他在《文明的进程》一书中对文明退化做了描述,例如,一些人把自己的民族视为人类生活中具有最高价值的民族,国与国之间的冲突增加;“战争危险”从未中断过,等等(埃利亚斯,2009:16-21)。“自反现代化”加剧,就是步入文明倒退途中的一种重大世界风险。这就是所谓“埃利亚斯陷阱”的警示意义。

当前,国际社会面临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融合发展的趋势,为经济社会发展与国家治理提供科技支撑,但这也可能带来应用场景中的负面作用。发达国家的高科技资本是战争的根源,而科技与劳动力、自然资源等共同成为资本盈利的工具,盈利最大化是“资本的逻辑”。马克思批评说,在资本逻辑下,“科学获得的使命是:成为生产财富的手段,成为致富的手段”(马克思,1978:206)。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技术对社会的负面作用并不是科学技术本身造成的,而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造成的。因此,可以说,现代社会科技的负面作用可以被称作一种“嵌入风险”。

确立新的旨在推动世界秩序良性发展的世界秩序新标准,反思与治理“自反现代化”风险和资本逻辑主导下的科技风险,阻拒世界文明倒退,已经成为当代世界学术界的一个重大课题,也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的一项紧迫任务。

五、美美与共：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世界百年未遇之大变局的特征之一是国家安全稳定发展风险加剧。和平崛起是中国对世界的承诺,创新发展是中国对世界的贡献。面对世界百年未遇之大变局,中国应积极参与改善现有世界秩序、构建新世界秩序的全球化治理现代化进程。“不断拓展同世界各国的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在更多领域、更高层面上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不依附别人、更不掠夺别人,同各国人民一道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把世界建设得更加美好”(习近平,2018:22-23)。

近代世界历史表明,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具有深刻的虚伪性与利己性,霸权主义是战争的源头。同时,全球化时代的世界交往使各民族联系为一个整体。马克思曾经要求工人阶级洞悉“国际政治的秘密”,“简单的道德和正义”是“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中“至高无上的准则”(马克思,1972:134-135)。正在诞生的新社会的“国际准则是和平共处”。当前,世界基本格局仍然是美国一家独大,而且还不是孤家寡人,它还有一批“身强体壮”的盟国。在美国霸权联盟仍然存在的今天乃至今后一段时期,世界还走不出各国相互防备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①与此同时,中国与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日趋活跃,成为制衡世界霸权体系的重要力量,正在推动多极化世界经济政治体系、多边全球治理体系的建构。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的主旋律。

以和平与发展为主旋律的良好世界秩序的最终达成,需要全世界联合、共同努力。“人的真正的本质是人的共同体”(马克思,2002:394),人类社会的目标是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真正的共同体。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向全世界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强调“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各国合作共赢,“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胡锦涛,2012)。中国领导人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上首次阐明“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习近平,2015)。2017年2月,“人类命运共同体”写入联合国决议,从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开始成为全球共识。

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基础是各国相互尊重“国家发展权”。一是世界各国都有发展的权利,发展不是少数国家的特权。发展权神圣不可侵犯,他

^① 1618—1648年欧洲爆发了大规模国际战争,主要国家卷入德意志内战,史称“三十年战争”。威斯特伐利亚体系(Westphalian System)是由三十年战争结束前后一系列和谈达成的条约缔结而成。

国不能阻止、不能剥夺。这是联合国承认的“发展权利”。二是各国都有按照国际规则公平竞争的发展权利,他国不能采取任何不正当竞争手段,损人利己。三是各国都有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西方中心主义认为,现代化是一个西方化的过程,而中国却选择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如果中国成功就意味着西方的失败。这种看法无疑是错误的,在世界文明多样性的背景下,各国的发展道路不同才是正常现象。四是各国都有和平发展的权利,远离战争、远离贫穷是世界文明的重要内涵。五是各国都有分享发展成果的权利,全球发展需要各国相互合作,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六是国际社会要促进各国发展权利,其保障来自以联合国宪章为核心、体现公平正义的国际规则。可以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是从资本主义的“虚幻共同体”走向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共存的“现实共同体”,进而向理想的“真正共同体”一体化发展。

我们期待,中美等世界大国重建国家间信任,重回国际关系良性互动的正轨,共同承担推动良好世界秩序发展的国际责任,形成全球治理现代化的新格局,造福全世界人民。我国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提出的“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主张是适用于共同体建设的社会学原则。中国在和平崛起的进程中将理念不断付诸实践,创造条件加强与各国的交往,特别是在抵制霸权、和平共处中逐步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不断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参考文献:

- 阿瑞基,杰奥瓦尼,2011,《漫长的20世纪》,姚乃强、严维明、韩振荣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 埃利亚斯,诺贝特,2009,《文明的进程》,王佩莉、袁志英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 贝尔,丹尼尔,1985,《后工业社会的来临》,高铨、王宏周、魏章玲译,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
- 贝克,乌尔里希,2004,《风险社会》,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 贝克,乌尔里希、安东尼·吉登斯、斯科特·拉什,2001,《自反现代化》,赵文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 贝克,乌尔里希、约翰内斯·威尔姆斯,2001,《自由与资本主义》,路国林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 布罗代尔,费尔南,1992,《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二卷,顾良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1997,《资本主义的动力》,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陈明、韩明秀、周海燕,2015,《中国高科技产品出口竞争力发展趋势及对策研究》,《国际经济合作》第4期。
- 陈钰、徐英华,2018,《从〈科学与工程指标〉看世界科技创新格局》,《全球科技经济瞭望》第1期。
- 陈钰、玄兆辉,2021,《中国国家创新能力的评价与展望——基于〈国家创新指数报告〉的研究》,《科技导报》第21期。

- 邓小平,199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恩格斯,200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方陵生、梁偲,2018,《〈2018 科学与工程指标〉:全球发展趋势》,《世界科学》第3期。
- 费孝通,1988,《费孝通学术精华录》,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丰子义、杨学功,2002,《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全球化》,北京:人民出版社。
-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2022,《巨大的经济竞争:中国与美国》,《大译编参》第27期。
- 胡锦涛,2012,《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网([http://politics. people. com. cn/n/2012/1118/c1001-19612670. html](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2/1118/c1001-19612670.html))。
- 霍夫施塔特,理查德,2021,《美国的反智主义》,张晨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 里夫金,杰里米,2012,《第三次工业革命》,张体伟译,北京:中信出版社。
- 罗青,2012,《美国〈2012 科学与工程指标〉概论——研发投入》,《全球科技经济瞭望》第11期。
- 马克思,197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1978,《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北京:人民出版社。
- ,200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宋林飞,1995,《“中国经济奇迹”未来与政策选择——国际市场的挑战》,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 王烁,2016,《解读美国〈2016 年科学与工程指标〉报告——全球主要国家研发投入和产出》,《全球科技经济瞭望》第6期。
- 习近平,2015,《习近平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共产党员网([https://news. 12371. cn/2015/09/29/ARTI1443480286202978. shtml? from = groupmessage](https://news.12371.cn/2015/09/29/ARTI1443480286202978.shtml?from=groupmessage))。
- ,2016,《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 ,2018,《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
- ,2021,《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讲话解读》,新华网([http://fms. news. cn/swf/2021_qmtt/7_6_2021_qm/index. html](http://fms.news.cn/swf/2021_qmtt/7_6_2021_qm/index.html))。
- Aron, Raymond 2003, *Peace and War, A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Jersey: Transaction Publishers.
- Bourdieu, Pierre & Loic J. D. Wacquant 1992,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olby, Elbridge A. 2021, *The Strategy of Denial: American Defense in An Age of Great Power Conflict*.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Mennel, Stephen 1990, “Decivilizing Processes: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and Some Lines for Research.”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2.
- OECD 2015, *Word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dicators* ([http://www. wipo. int/edocs/pubdocs/en/wipopub_941_2015pdf](http://www.wipo.int/edocs/pubdocs/en/wipopub_941_2015pdf)).

作者单位:常州大学苏南现代化研究院、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
责任编辑:张志敏